



西藏问题的近代迷思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007-08

● 袁 剑

[摘要] 本文通过对林孝庭的《西藏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边疆:1928至1949年的权谋与民族政策》一书的解读,探讨了国民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政策,并指出应该从更多的视角去探究西藏问题,以找到真正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方。

[关键词] 国民政府;西藏;边疆;民族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历史中,关于边地的故事时刻交织在核心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并往往进而成为内地民众构想其理想社会的载体。就像梦幻般引人追寻的“香格里拉”一样,现实中的西藏问题在近现代成为各方力量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场景之下,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西藏有着差别巨大的心灵体验。在大一统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作为大众的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西藏会成为一个问题,西藏的独特之处或许只是在于其宗教信仰与地理位置,其他诸如政治与社会的问题皆只是小细节而已。而西方人对于西藏则有着一种将猎奇与西欧式帝国主义观相互混杂的心态,这种心态也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中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彼此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过程就值得关注,它反映了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理解差异的问题。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就提到了印度北部地区的蚂蚁掘金传说。到了中世纪,西方对于西藏的认识仍然没有多少增加,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要远逊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直到蒙古将领拔都率军远征欧洲之后,当地的人们才对西藏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①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开始用 Tibet(Thebeth)来称呼元朝的乌思藏(西藏)地区,②并作了甚多叙述,但马可·波罗本人并未到过西藏,故而大多为奇思异想。西方人与西藏的真正接触应该始于传教士时代,即公元 15 世纪左右。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夸德(P. e Antonio de Andrade)是最早到达西藏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其 1624 年的信件《新发现大震旦即西藏》(Novo Descobrimento do dram Cathago, ou Reinos de Tibet)③中认为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颇多相似之处。④在启蒙时代,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大多批评西藏的落后与野蛮,到了殖民时代,对西藏的憎恶更加明显,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东方学家们对当时的藏传佛教抱有否定性的看法。可以说,当时的西方基本上还是孤立地看待西藏地区的问题,其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尚未明显纠缠其间。

进入近代,随着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清朝在东亚无可争辩的主导型地位逐渐瓦解,东亚朝贡体系开始走向崩溃。在这个过程中,东亚的整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西藏地区也成为当时英国、俄国甚至日本势力争夺的重点,致使其“涉外关系,和中国本部一样,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大变局”。⑤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在乾隆朝达到顶点之后逐渐弱化,清朝在西藏的管治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能贯彻到底,西藏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高度自治”的状态。⑥进入 20 世纪以来,无处不在的现代性逐渐消灭了国家内部和外部之间曾经存在的边缘地带,民族国家的基本单位在当代社会成为诸多研究所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状况,而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究竟是宗主权还是主权,

① 参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28.

②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8.

③ 1626 年于里斯本出版。

④ 他在信件中这么说:“喇嘛是他们的神父。那里喇嘛很多,他们同我们的神父一样集体居住,而其他神职人员也与我们相仿,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家里。他们都很穷,靠别人施舍度日。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品行。……他们的宗教歌曲与我们的一样,歌声温柔,但很坚定。……那里的‘祈祷之家’与我们的相仿,很干净,屋顶和墙壁画满了图画。……他们还说,上帝既是一人,也是三人一起,所以,上天之母和天子就理所当然地掌握天主圣三位的秘诀。……他们也有圣水缸,圣水缸很大,所有的人都可以把圣水带回家。他们也有一定的洗礼仪式,似乎同圣洗差不多。”这一信件全文收入[意]G. M. 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71~96.此处引文见 93~94 页。

⑤ 孙子和.西藏研究论集[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11.孙子和先生还认为:“尽管英国侵略西藏的目的学者所见未必相同,但因藏印疆土毗连,对于西藏的影响,无疑是最为直接而重大的。俄国对于西藏起意甚早,也曾透过各种关系,巧妙地与西藏建立良好的‘友谊’,使得西藏在初期的对外关系上,出现亲俄反英的局面,其后由于国际情势的演变,才变成倒向英国的结果。至于日本,她对西藏的接触与了解,大都透过佛教的桥梁,对于西藏的政治企图与野心,远不及英俄两国的积极。”见其书第 11 页。

⑥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清朝末年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力度逐渐弱化,但清廷与西藏地方的统属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遂往往成为一个成王败寇的问题,论述历史的出发点,往往不在历史之中,而在当下。^①正如汪晖在其《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中所指出的,西方在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关于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于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这一点美国关系最深。第三是对于西藏的同情混杂着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②表现在学科分类上,西方的藏学研究一直都自外于中国研究的范畴。以笔者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学术经历为例,每次在与研究班同学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始终以欧洲的视角观察西藏问题,每每向笔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放弃这块地区?为什么西藏不能独立建国?”在他们看来,似乎在东亚形成像西欧一样的小国林立的局面是一种美好的选择。对此,笔者只能耐心解释:欧洲(尤其是西欧)自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就不再存在长期统一的大帝国,小国寡民的状态在欧洲历史中成为一种常态,欧洲近代多位政治强人试图一统欧洲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如法国的拿破仑以及德国的希特勒),这种历史经验使得国家“小而美”的理论在普通欧洲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他们进而往往以此为衡量外国的标准,似乎欧美传统之外的大国都是“可疑”的。而在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一方面,持传统观念的历史编纂者们与普遍舆论皆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为荣,而对帝国的分崩离析感到惋惜不已,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弱势局面使得整体性的中华民族主义意识得到强化,进而强化了中国人对国家一统的观念性认识。当笔者的德国同学在提及两德统一的历史时,笔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愉悦,这给笔者以强烈的震撼,因为在论及关于德国的问题时,笔者同学所持的关于欧洲国家“小而美”的观念就彻底让位于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了。这难道只是偶然吗?

“西藏独立”问题同样具有这种西方式的“选择性关注”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源自现代国际政治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而且还是西方对西藏的“想象化认识”的一种逻辑性延伸。西方在东方学传统下将藏学研究与中国研究区别对待的学术设置使得“西藏独立”问题在学理上成为一种既定的规则。西方研究中所充斥着强烈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亦被当作是一种普世性的原则强加给他们未曾深刻感受的东方世界。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曾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nationalism is primarily a political principle that hold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③这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实际上完全是为西欧的族群分布与国家态势而度身定制的,在被马克思

① 柯娇燕(Crossley)即认为西藏在清朝的观念体系中被转化为一种有着巨大重要性的“理想形态”。参见 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Manchu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p. 113~115.

② 汪晖.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J]. 天涯, 2008, (4). 原文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翔于2008年4月19日对作者所作的一次访谈的记录。

③ 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

称为“民族牢笼”的俄国就已经失效。但吊诡的是,这一原则依然被用于东方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所具有的在解释此类问题上的文化霸权感遂油然而生。正如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所言:“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①这种学术的傲慢深深楔入西方对当代政治问题的诸多角度,并以一种被视为 universal 的方式成为先验的普世原则,但他们从未能系统论证过。美国没有西藏,欧洲没有西藏,有的是从片言只语中构建出的一个欧美式的“西藏世界”^②他们还以这种“西藏世界”替代真实的西藏世界,并进而将这种“西藏世界”引进国际政治实践之中,这就必然会出现误解与冲突。

历史编纂总是在有意识的“记忆”与“遗忘”中塑造其俨然的逻辑顺畅性。作为无法脱离所在国家身份限制的个人始终在真实逻辑与国家话语之间苦苦挣扎。当我们再次检视西藏问题时,对于所关注的问题保持必要的继续似乎就成为一种必要。笔者所作的硕士论文以清代西藏法制为中心,而笔者有意识地与近现代的国家话语保持距离,这种饱含自我意识而同时又是回避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笔者对所研究的中心问题的深入思考。^③在某种情况下,保持某种历史的疏离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观察清楚一些问题并了解事件发生的真正历史背景。当检视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西藏政策问题时,海外华人学者恰恰具备了这种适当的历史疏离感,从而也有了展示一个更为真实的场景的可能性。林孝庭(Hsiao-ting Lin)的《西藏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边疆:1928至1949年的权谋与民族政策》(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就进行了这一尝试。^④本书曾获得2007年国际亚洲学者协会(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奖。林孝庭目前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其研究主要涉及中国边疆族群问题。本书是他在其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力图通过对原始档案的探究重塑国民政府时期的汉藏关系实景,并通过对汉藏历史关系与当时的具体国际背景的进一步考察对当时的汉藏关系加以重新检视。全书除了图表(Maps, Tables, Photographs)、前言(Preface)、致谢

①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10.

② 这种美妙的“西藏世界”是在西方“神智论”(Theosophy)观念下对西藏的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西藏是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依旧保留着精神纯洁性的和平美丽的地域,在这块地域之上到处都是充满着智慧的人。这一想象与近现代西藏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但成为西方对西藏理解的一种想象性基础,深深植根于西方人的心中。

③ 笔者硕士论文的精简修订版名为《清代西藏终审权问题再研究》,繁体字版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法制史学会合编的《法制史研究》第14期(2009年),简体字版则随后收入张世明、步德茂、娜鹤雅主编的《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644~1911)》(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均可酌参。

④ 《汉学研究通讯》第102期(2008年5月号)曾载有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王文隆对于此书的一篇简要书评,亦可酌参。



(Acknowledge)以及最后的后记(Epilogue)、注释(Notes)、人名与术语(Glossary of Names and Terms)、书目(Bibliography)、索引(Index),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背景”(The Setting)、“1928~1937年的战前时期”(The Prewar Decade, 1928-37)、“1938~1945年的战时阶段”(The Wartime Period, 1938-45)以及“1945~1949年的战后阶段”(The Postwar Period, 1945-49)。

在东西方冷战及意识形态分野的背景下,在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民族政策更多地被妄加论断,研究不是处于经验性的调查与严格的文献考索基础之上。近年来,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汉文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尤其是蒋介石日记的整理出版,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开始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以检视至今依旧挑战着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西藏问题”的直接的历史背景,而该书作者的研究也正是立足于对新出档案材料的利用之上。而正是这种对新材料的运用,使得作者的研究能够发掘出新内容并进而得出更为新颖翔实的结论。

对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是进行文本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要厘清近代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汉藏关系,就有必要清晰把握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汉藏关系脉络。本书的第一部分即由此展开,主要论述了汉藏关系的历史背景。“中藏之间,虽然久具历史渊源,但以有清一代最为密切。”^①在清朝,通过藏传佛教尤其是与格鲁派的内在联系,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确立起了强有力的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通过清廷颁布的各项治藏章程、驻藏大臣制度以及金瓶掣签制度而得以有效维系。这种政治联系随着清朝在19世纪中叶的日渐衰弱而弱化,诸多驻藏大臣办事不力也加剧了西藏地区的离心倾向。^②与此同时,英国的帝国势力在南亚地区大举扩张,在两种政治力量的冲撞过程中,西藏地区自身政治意识开始有所表现,并以一种自认的“自主”力量开始某些跨国性政治活动。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初期的中国政治与疆域状况作了相关的背景性介绍,并说明了1928年之后国民政府内部的边疆政策规划结构,力图揭示出是什么真正塑造了国民党早期统治阶段的“中华民国”,以及说明如何在这一广阔的政治与组织背景中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边疆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于1929年正式依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了蒙藏委员会,负责处理蒙古、西藏及其他各地区蒙古族、藏族事务。该委员会先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这一组织安排,一方面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藏地区的主权领有,另一方面又凸显出西藏与藏族问题在整个国家事务中的特殊地位。而该委员会的具体行动也显示出国民政府在处理具体的西藏问题中所持有的灵活态度。在实践层面,南京国民政府管治大陆时期所采

① 孙子和.西藏研究论集[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83.

② 孙子和先生即认为:“造成西藏疏离中央另一重要之因素,则为清廷本身处理藏务之失当,亦可说是清廷私心自用,重满抑汉所造成。自乾隆年间定下治藏章程以来,驻藏大臣毋宁为西藏与中央关系之关键人物,藏务之良窳,与驻藏大臣之人选有莫大关系。然而在驻藏大臣之派遣上,固然无一汉人,在帮办大臣方面,除了清末之张荫棠、温宗尧外,亦少汉人担任。张、温在藏时间甚短,但却表现不差。驻藏大臣之中,除和琳、琦善少数二三人外,大都治绩不彰,至如有泰之昏聩无能,鲜有不误事者。驻藏大臣不能居间调和,甚且滥权贪墨,威福自用,欲使西藏不疏中央,不可得也。”参见孙子和.西藏史事与人物[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156.

取的对藏政策与行动并不像政府声明所表现的那般刚性,而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灵活变通,多有妥协。政策宣示与具体实施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现象也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事实上,正如法国东方学家亚历山大·达维-耐尔(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所称的:“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无疑,藏族与汉族自古以来就在战场上和粗野的交涉舞台上不断较量过,双方都不乏诡谲与狡诈,但彼此却从未闹到要一刀两断的地步。”^①中国的民族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却不至于酿成激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看似刚性和一体化的政府对外宣示的表面下,政府对于国内各民族始终采取灵活多变的態度,而不将某种固定的原则贯彻到底。观察目前大陆对西藏问题的处理也应该考虑到这一层面的问题。

1927年以后,随着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秩序的确立,西藏地方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而几乎与此同时,汉藏边界之间爆发了自1917~1918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这一时期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大致是和平建设时期,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不再构成致命威胁,中央政府在试图收回地方权力的过程中,通过诸多并不伴随相应实际行动的政策性声明以宣示对全国的主权。在处理西藏问题方面,国民政府周旋于西南军阀势力以及英国之间,三者形成一种时紧时松的三角关系格局,如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所言:“中华民国尚无力彻底控制西藏。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都是欧洲列强的盟国。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西藏,它们都明显不能够宣布西藏独立。”^②这成为作者在第二部分的关注重点。作者指出,先前关于汉藏关系的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就试图重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果考虑到国民党对国家的重新统一、反帝国主义与反民族奴役以及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不懈追求的话,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有让西藏回归的构想,就显得令人惊异。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统治的初期是否真正希望西藏会无条件地和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值得讨论,而国民政府所执行的“边疆政策”(frontier policy)背后隐藏着较之单纯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政治考量。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内部一体化与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对汉藏关系的探究能够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中的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有新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藏问题格局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态势。作者在第三部分中指出,随着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西迁以及西南军阀的抗日举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被中央政府所牢牢控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迁时期的国民政府对于西藏问题反而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在实际上默许了西藏地方政府设置“外交局”,同时为了中印公路的顺利修筑,亦默许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当局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进行谈判。而在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西藏地方政府过于独立而转投轴心国集团,国民政府与外部的英国等力量又对西藏地方政府施加了重大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通过扩充驻藏办事机构的机会强化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能力。随着美日之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华民国遂有机会成为四大盟国之一,国民政府遂有了国

①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李凡斌、张道安译:《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M].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2.

②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M].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85.



际支持以重申对边疆地区的主权。作者指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蒋介石曾试图通过军事行动以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国民政府在战时对西南地区的控制的加强源自对统治安全与生存的需要。这种政治行动较之孙中山时期只具观念轮廓的中华民族主义要远为重要。

本书的第四部分则主要论述国共内战时期的边疆状况与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转变问题。一方面国民政府于 1949 年 8 月匆匆举行的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仪式在法理上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另一方面,随着班禅额尔德尼不久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原先国民政府所具有的法理上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在实际上和平转移给了共产党政权,“新的北京领导人打算对喇嘛和活佛(至少对较为显贵的喇嘛)仍旧采取这种敕封。他们在敕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时已经沿袭了传统的作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姿态。”^①这一事件使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得以在 50 年代初与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当局达成和平协定。而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大陆中央政权所面对的西藏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南京国民政府管治大陆时期的各项政策与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政策与行动方面既有成就,亦多有失误,各种措施并不比现在的大陆中央政府所实行的措施更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认为,国家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这确实是对传统国家理论的一种突破。但是,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我们往往以一种颠倒了的逻辑进行阐释,在这种逻辑中,国家成为想象共同体的唯一途径和结果,任何关于共同体的想象都被贴上了建构国家目标的标签,而诸多的论述也以这种逻辑进行,“就如处于支配性国家的背景中一样,民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遭到人民的同一性和同质性的否认”。^②中华文化中所惯有的对于政治性的前置使得诸多的研究工作了无意义,而同时,西方在对这些边疆问题上的作壁上观与指摘也使研究方向发生了偏误。作者作为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尝试着对这一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本书也依然存在某些缺陷。作者尽管在材料上充分发掘了诸如伦敦大英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英文资料以及台北的国民党及“外交部”档案,但是可能是由于条件所限,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的相关档案材料则未能加以利用,更未能使用相关的一手藏文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如汪晖所言,“西藏问题”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态势下远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它还是西方将自己的帝国主义式的承认政治——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主题单位的承认体系——扩张到亚洲地区时形成的一个标志性问题。一方面,如今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说,西藏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所存在的巨大的社会多元化使得西方民众基于“想象的西藏图景”而在西藏问题上的某种误导性支持在西方民主的背景下极大地模糊了国际法层面对西藏地位的清晰定位。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所流行着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分析路径使中国的印象极为趋近于业已解体的苏联,很多西方学者往往将研究苏联得出的结果与规则搬到另一个研究对象——中国之上,从

①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李凡斌、张道安译.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M].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4.

②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8.

而得出某些似曾相识的结论。但是,中国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国的边疆民族的发展历程也独具特色,中国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民族结构并不是俄国-苏联模式的“套娃”结构,而是多民族以及民族内部次生群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结构,藏族也莫能外。“西藏与中央,不但有悠久之历史渊源,也有其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藏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藏胞是中国同胞的一员,西藏与中央是互相依存的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藏经即多载‘藏不安,汉不平’之语,可见两者共存共荣,乃属必要,万无中国灭亡,藏族独存之理。惜一般见不及此,仅藉经上之语,作为向中央争取土地之藉口,而不知汉族平安之系于两族一体,必须坦诚相处而共同奋斗也。”^①事实上,西藏本身内部也是复杂多样的,要理解并解决“西藏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打破将西藏总体化的认识模式,以一种更为现实的视角与态度去看待西藏,这个地方并不只存在一个神灵,也有着喇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外更多的教派与共同体的声音,同样,这一地区也并不仅仅只生活着藏族民众,同时也是中国诸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很多近现代中国其他地区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西藏同样也会出现。如果我们将西藏也作为一个内部分化复杂的结构来加以看待的话,或许有些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本文英文摘要见 P.21)

参考文献:

- [1]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 [2]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3] [意]G. M. 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 [4] 孙子和.西藏研究论集[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 [5] 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Manchu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 [6] 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J].天涯,2008(4).
- [7]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8]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 [9] 孙子和.西藏史事与人物[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 [10]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李凡斌、张道安译.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M].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
- [11]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M].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
- [12]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收稿日期]2010-06-10

[作者简介]袁剑(1981~)男,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 100872

① 孙子和.西藏研究论集[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201.



全的特征 安全的威胁来源随意性大 无法预测和掌握 受到安全威胁的主体有个人、社区、团队和国家 恐怖袭击的对象多是平民 手段多样残暴 恐怖袭击的组织实施往往是境内外勾结 境外策划指挥 境内组织实施等。同时它又具有传统安全的特征 威胁边疆安全和国家安全 目的是分裂国家 制造民族矛盾 颠覆政权 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层次上说 新疆非传统安全相关问题具有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交织 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交织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交织 跨国民族问题与一般民族问题相交织 而各类问题又相互交织的特点。从性质上说 新疆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涉及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新疆非传统安全问题体现出综合、交织的特点。

5. 各种原因导致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新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自然与社会、国内与国外、民族与宗教、经济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 产生的原因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也有历史、现实、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 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从历史角度看 产生的问题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背景 历史发展中所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从现实看 各类问题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发展问题甚至国际问题相交织。从地缘环境来看 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极端宗教盛行 邻近的相关国家也面临许多相同的问题。从国际环境看 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对我实施“分化”、“西化”战略 而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也引起西方的不安 对我采取多方面的遏制。这一切均说明 新疆边疆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

总之 以“东突”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目前新疆边疆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 并由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形成自身的多方面的特点。要构建安全稳定、和谐发展的新疆安全环境 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 结合它们的特点 开展有的放矢的工作 构建新疆非传统安全体系 不断提高非传统安全的建设能力。

[收稿日期]2010-07-03

[作者简介]李正元(1964~)男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 兰州大学校办。
兰州 730000

On the Problem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Xinjiang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Li Zhengyuan

Abstract: The “East Turkistan” forces,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transnational drug business, water shortage, land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disparity are the main non-traditional factors threatening Xinjiang border secur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problems are ethnic, religious, transnational, interweaving, chronic, complex and difficul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Xinjiang; ethnos and religion; characteristic

(上接第 14 页)

The Modern Myth of the Tibetan Issue

Yuan Jian

Abstract: Through the detailed reading of the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written by Hsiao-ting Lin,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Tibetan polic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holds the idea that we must explore the Tibetan issue in more ways to find the methods which can solve the “Tibetan Issue”.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ment; Tibet; frontier; ethnic groups